

绪 论

考古学者将早期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根据生产工具和武器的材质，区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青铜为红铜与锡的合金，其熔点较红铜低，硬度较红铜大，在浇铸时气泡少，流动性好，可铸出锐利的锋刃及精细的花纹，适于制作坚实的兵器、工具及金光亮丽的容器。

我国的青铜时代历经夏、商、周三朝，约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其历代均有丰富的青铜器实物遗存于世，有地下发掘物，也有流散各地的传世品。为了更好保护和收藏祖国的珍贵文物，研究青铜器的递嬗演变，就需要对它们的制作年代和真伪，进行科学、准确的鉴定。

墓葬中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旧貌自然，可藉墓葬和其他随葬品佐证参考，并用现代科技方法进行鉴定。而大量存于民间，流通于国内外文物市场的所谓传世品，大多是非正规的发掘物，加之宋朝以来三代青铜器的仿制摹古之风盛行，赝品充斥，鱼目混珠，用现代科技方法，成本较高，年代测试数据误差较大。所以，鉴定青铜器文物，除了需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艺术等历史知识有综合的了解外，还要靠我们的鉴定能力，从把握各代青铜器的典型风貌和基本特征着手，作规律性的认识，进行科学的鉴别。

此书旨在对夏商周秦汉各代青铜器的时代风格、基本特点与发展规律，有一全面的阐述，同时对后世伪作赝品的制作方法和特征进行归纳、分析，希望对从事青铜器收藏和鉴定工作的同志有所裨益。

在绪论中，仅对我国古代青铜器鉴定的基本要点作一简要的介绍。

1. 造 型

中国古代青铜器有着丰富的造型，它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各类器型的出现和演变，多能确切表现本时代的礼仪制度、审美标准、风俗面貌和技术条件。若能熟悉并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特色，就掌握了一种比较可靠的鉴定方法。

对于夏商周各代的一些典型器型，特别是知名器物，更应烂熟于心，形成固有的正宗概念。因为越是知名器物，越是有去仿制。在鉴别中，有了准确的器型概念，就能善于体会各时代的不同风格和特色，无须多究，便可一眼识破那些低劣的赝品，对于那些貌似伪作，经细心体察和揣度后，也能看出其细微差别和破绽。

在掌握各时代青铜器各种器型的特征及时代风貌的同时，应侧重对形制的轻薄、厚重、粗糙、华丽、朴素、繁复等不同风格进行研究，分析对比，摸清其演变规律。久而久之，便可充分利用不同器型特征，熟练地鉴别真伪。夏代的青铜器器小体薄，加之品种较少，后仿者寥寥无几。商朝时期造型种类明显增多，并且制作精工，有些是空前绝后之作，以故宫博物院的三羊尊为例。这件珍贵的大型盛酒器，

气势雄伟、肩部装饰的

三只高浮雕卷角羊头，形象逼真。此尊是经过两次铸造而成的，先铸尊体，并在肩部相应的位置上预留孔道，然后在孔道上再搭陶范，铸造羊头，合范法铸造工艺，这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图 1 另外迄今发现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殷墟吴家柏树坟园出土的后母戊（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

图 2 这件巨大的青铜鼎表现了商朝后期青铜制造业的发达和

繁荣。这时青铜器还出现有许多动物形的容器，可作立体雕塑观赏，如象尊、犀尊、豕尊、羊尊等等。最常见的是鸛卣，卣像两鸛相背而立。

图 3 正是由于其超凡的艺术价值，后世仿品赝作众多，但若不具备很高的



图 1 商代晚期三羊尊



图 2 商代晚期后母戊大方鼎



图3 商代晚期鴉卣



图4 春秋莲鹤方壶

技术水平，难以仿制成功。西周时期又有许多创新之作，风格上古拙简朴与凝重典雅兼而有之，只是比起商朝时期的作品未免粗糙。

东周器型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春秋时期，由于分铸法的广泛应用和失蜡法铸造的出现，制造出了很多造型优美，结构复杂的青铜器物，莲鹤方壶就是这时的件伟大作品。图4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则趋于轻灵奇巧、简易实用。后仿者很难追摹

对于古代青铜器的造型，要从以下几点去观察：耳、口、流、颈、腹、鋈、足、底和器里。只要熟记器体各部位的大小和比例关系，以及器物体重厚薄，再参考纹饰、锈蚀、铭文等各种特征，分析对比，就能辨别新旧真伪。

2. 纹 饰

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青铜器铸造工艺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方面，不同时期的纹饰均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这是给历代青铜器断代和辨伪的有力证据。

夏代青铜器一般平素无纹饰。商代早期青铜器的纹饰，还没有作为图案衬地的花纹，即所谓地纹。纹饰大多作带状，并常见弦纹、兽面纹和夔龙纹。兽面纹的线条圆转流动，很有特色。在带状兽面纹上下夹以连珠纹，则是当时流行设计。商代中晚期纹饰内容丰富，变化更加突出，不但流行通体满花，绝大多数使用云雷纹作为地纹，以填充主题纹饰外的空间，而且还出现了在图案上重叠加花的所谓三层花。于是在青铜器上形成了富丽繁缛之风格。此期青铜器纹饰中动物纹样大大增加，最典型的花纹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饕餮纹，其形状多变，一般尾部下卷，鼻额突出，咧口利爪，巨目凝视，雄严诡奇。有的大幅饕餮纹纹体鼓起，曲角高耸，突出器外，配以浮雕龙、虎、羊首、鹿首和牛首等动物形象，峻挺方折，精湛无比；有的全身满施饕餮纹，器体棱脊四起，深镂细刻，富丽堂皇。其他花纹还有夔纹、蝉纹、蚕纹、小鸟纹等。这些动物纹样，少数是肖生的，更多的则是神话性的禽



图5 商代晚期三层花簋



图6 战国 蟠螭纹铜镜

兽。西周 F-3 件同器纹饰渐趋简朴，带状花纹又流行起来。纹饰以人小分尾鸟纹、顾首夔纹、窃曲纹为主。早期常见的蝉纹、蚕纹、象纹等写实的动物纹样已经绝迹，复杂的饕餮纹变得浑朴简小，山器物的

主体退居到不著 GII 的足部。春秋在装饰方面，这时代表一种新的趣味、观念、标准和理想的青铜艺术在勃兴。构图细密，成网状布局的蟠螭纹和蟠虺纹的产生，则是新潮流的一种标志。蛟，一些古籍中说它属龙。所谓蟠螭纹，指以两条或更多小螭龙相对纠结。□画二到虺，《国语·吴语》说“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青铜器仁的蟠虺纹，则是许多小蛇状的动物相互缠绕。它们都是作为花纹单位重复出现的一类纹饰。蟠螭纹和蟠虺纹是由神话动物构成的，但它仅是图案，一种供人欣赏的装饰，小再有神秘的意味。战国青铜器，在 E 艺卜继续对纹饰进行了革新改造，除蟠螭纹外，流行钩连雷纹、贝纹、绚纹，同时大量出现方块形或二角形云纹。贵 F' 器物往往采用生产 玃序最为繁复，形式最为华丽的错金、错银、嵌错红铜、松石和细线刻镂等先进的「艺技术。一些嵌错着描写当时贵族宴饮、征战、格斗、乐舞、射猎等现实生活图像的器物，斑驳陆离，多彩多姿。在断代和鉴 ; I 真伪时，要知道一些特殊风格图案和装饰的风行时代， r 解其社会背景。对同一纹饰在

各个时期的不同演变，也应作大量细致的对比分析。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并掌握纹饰内容和风格的发展规律。

作伪者虽费尽心机照抄古代青铜器图样进行仿制，但终究貌合神离，难以准确再现原物神韵。因为，后仿在作伪的过程中必遇到本时代不可逾越的障碍，受到本时期原料、工艺条件的限制，达不到先人的制作水平。另外，纹饰也有各时期特殊的表现和微妙的时代特点，往往为后世伪作者所忽略，不知就里，张冠李戴，如：战国器上饰以商代饕餮纹；商代器上出现东周时期的蟠螭纹。

鉴定真伪，还可根据铸纹和刻纹的不同特点加以区分。如商周青铜器的铸纹线条间的凹槽呈上窄下宽状；花纹线条转折处微显圆，并非直角。若从纹饰的线条上来观察后仿器，则觉生硬、滞断、呆板。对于那些旧胎刻填加漆、加金银片的伪器物，往往难以一下识破，还需结合其他方面特征，研究辨析。

3. 铭 文

商周青铜器的珍贵价值，突出表现在铭文上。西周是金文的最盛期，金文成为明确其时代的关键史料。对于西周金文的断代问题，王国维在考释《通簋》时指出：“此敦称穆王者三，余谓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满也。”何以生称穆王？曰：“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学者称其断代原则为“时王生称说”。郭沫若用此原则先定出若干“标准器”，然后将与其人名、事件有关，形制、纹饰相近诸器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时代相近的器组，此法被称为“标准器断代法”。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串联西周铭文250件，取得很大成功。唐兰先生著名的《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和《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铭刻》，也讨论了西周金文断代问题，他提出金文中的“康宫”即康王之庙，凡记有“康宫”的铜器应定为康王身后之器。根据这一原则，金文中所记“康宫”中的“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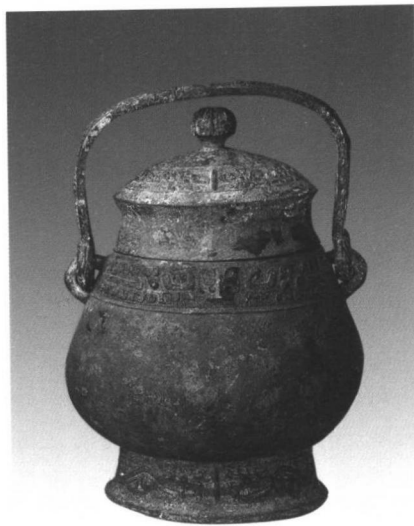


图7 商代晚期 二祀邲其卣

宫”、“厉宫”，应为夷王、厉王之庙。金文中凡记有夷、厉二宫之器，自应是夷王、厉王身后之器。他的这些分析，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与考古发掘的器物相矛盾者，并不断被新出土的铜器铭文所肯定。因而，他的“康宫”原则也逐渐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细致观察铭文字体和内容也是断代和鉴别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判别伪作时，运用铭文特征就能及时剥去伪装，鞭辟入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在文字结

构、遣词用句和铭文内容上都有比较显著的差别，可资代表当时的时代风格。

鉴别铭文时，可从铭文的内容来观察，注意字字数的多少与内容结构。商代前期青铜器上开始有了仅几个字的以象形为特征的族名金文。到了商代后期青铜器普遍出现铭文，故宫博物院藏邲其卣，铭文记述了帝辛时期的赏赐、祭祀等内容，它是商代铭文最长的几件器。

图7.8 此期有铭青铜器的多数铭文都极为简短，有的又有一个象形性很强的字，有的由几个象形的字构成一个短语。这类铭文虽少有文例比附，但多数可以在甲骨文方国名、地名、人名中找到同形字，其中有被学者释读钩则多是文献中的古国名或家族名。字数较多的族名，一般是可以分出方国、家族、私名等几个层次的。此外，也有小部分这类铭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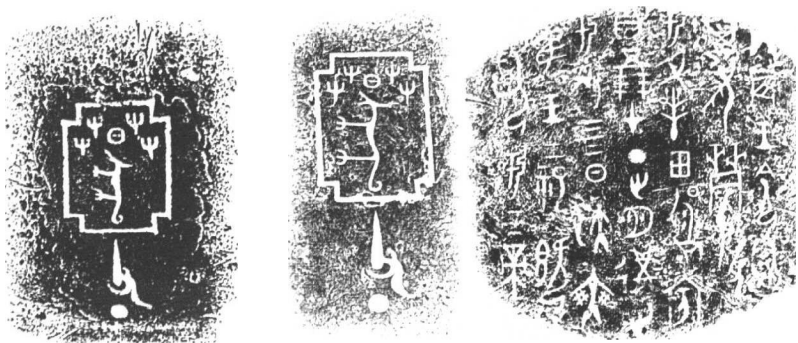


图8 商代晚期 二祀卣其直铭文

表示该铜器的方位、功能，或是八卦符号等，并不属于上述内容范围。族名金文最早出现在商代前期，多数属商代后期到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仍有少数残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真实状况。西周早期青铜器长篇铭文增多，有的直接记载了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重大历史事件，有的记述了分封诸侯、祭祀祖先以及与殷遗、鬼方、楚荆的战争和赏赐臣工等。西周中期铭文有的涉及当时土地和法律制度，有的则记载赏赐册命。西周晚期铭文在百字以上者屡见不鲜，有的可达近五百字，多记载对淮夷和玁狁的战争、土地纠纷、法律诉讼和赏赐册命等，其内容多可与《诗经》《尚书》等古文献相比附。在秋时期，青铜器铭文多作在显著部位，除书史性质外，也注重了装饰。文体多用韵文。战国青铜器铭文除个别长篇外，多为“物勒工名”

以各个时期所具典型字体入手，体会各代笔法的不同风格，也是断代和判伪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研究并类比各个时代不同形式的字体特点，找出其继承发展演变规律，乃和造型、纹饰一样，至关重要。商代后期书体为“画中肥而首尾出锋”的波磔体，有些字体结构尚未脱离图形文字的形态。西周中期铭文字体



图9 西周晚期 小克鼎



图10 西周晚期 小克鼎铭文

波磔渐少，结构趋于疏散。西周晚期铭文行款整齐，笔画匀称。厉王时的小克鼎铭文，是最具代表性的书体。图9、10 春秋，书体呈各种风格，晋、卫、虢、郑端庄秀劲，秦铭规整，吴越铭文修长，并加以禽鸟形的饰笔，极富艺术色彩。

另外，在注意总结不同时期青铜器铭文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的同时，也要注意实践，将真假实物铭文、相互比照、反复审度其字体的结构，排列的形式，铸造的部位、笔道的深浅等。切忌流于主观片面，妄断真伪。

4. 锈 蚀

古代青铜器几乎都经历过漫长岁月的地下埋藏。由于地下环境及出土后自然环境的影响，它们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经历的条件不同，所以古代青铜器上锈蚀的情况千差万别，凭锈蚀特点来辨伪也就相当重要。

青铜器在地下埋藏，受地下和地上环境中各类物质，如土壤中的无机盐、硫化物以及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硫化碳、氧等

影响也不一样。其中氯化亚铜和碱式氯化铜对青铜器是有害的。这些锈为白绿色，呈粉末状，故称“粉状锈”。除此之外，铜器上无害锈种类很多。这些锈是多年生成的，一般比较坚硬。它们是侵蚀铜质里生成的，是一层一层地长出来。坚固致密，不易剥落。

作伪的青铜器或部分作伪的器物必然要用铜锈伪装。而其表层也要经各种伪装处理。但不管怎样伪装，假的决不能变成真的。“点土喷锈”的方法，虽然伪装得很像，但一遇硬物磕碰就会脱落，一碾即成粉末状。用硫酸铜、氯化铵等化学调配做锈，效果很好，但终究不是长时间自然形成的锈，因此缺少层次感，显得锈是浮在器物表面。

对于真伪器表面不同的锈蚀观察方法，除以眼目直观外，必要时还可借助竹签和低浓度酒精等工具，特别是对较难鉴别的后作旧器。观察时更要注意锈蚀的色泽变化，光泽的新旧，以及锈层的厚薄等特征。再参考纹饰、造型、铭文的各种特征，分类对比，触类旁通，才不致真伪混淆，新旧模糊。

总之，要用我们的“眼力”来鉴别古代青铜器真伪，上述条件的掌握，至关重要。对于鉴定工作来说，单凭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才能真正做到鉴真识假。



青铜器与中国 古代文化

(一) 中国青铜文化的特点

中国青铜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相比有着显著的两方面的特点：

1. 成组合的具有“藏礼”作用的青铜礼器体系，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这是由于“以礼治国”是中国古代政治所独特的统治艺术，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仪体系，贯彻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了其后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带有鲜明礼仪特色的中国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礼，即礼制、礼仪，是指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它受政府的保护，有社会舆论支持，是任何人都应该且必须遵守的行为准绳。

自夏大禹的儿子启谋得王位开始，历史便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君主也由此而诞生。尊君抑臣、君贵臣卑便成了政府要实现的目标与维护的秩序，这个阶段的诸种行为

准则、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较前无疑且必须有所超越与不同。于是，夏礼除继承前人的礼制外，又增加了新内容，且把礼的外延推到了用器的方面。商因袭夏礼，因时而改。至周，复因商礼。有的改动也只是在商礼的基础上增加了时代的需求并舍弃诸过时的内容而已。

孔子在总结三代礼仪制度时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斯言，贵在于他概括了夏、商、周三代之礼仪制度的一脉承传性质，并从中看出彼此间的差异是为适应时代形势的损益。然其更可贵的一面，就是孔子已从三代礼制的承传变化情况中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即后世的礼制纵然少不了诸多对前代礼仪的损益，但已不可能超越《周礼》——周代礼制的基本框框。校诸史实，孔子的预言确实不差。而孔子对前代的总结，虽无更多的文献证实，但考古发现的众多材料于此正可补文献的不足。

近数十年来，几代考古工作者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遗址，偃师师乡沟及郑州早商遗址和商城、安阳殷墟、洛阳周王城、陕西长安沣西、沣东西周城址和墓地的发掘，已获取了大批量前儒注疏《周礼》及其他诸经时不可能目睹的礼器。从其中能构建起来的礼制用器情况看，夏商两代共有的爵、觚、斚之组合，商周两代一体鼎、簋、编钟等之组合及使用，乃三代礼制承继一体的表现。就是商、周之礼分别以夏、商之礼所“益”的部分。此外，簋在商代的出现，敦、簠、盥、禁等在西周的使用，可谓也是“益”的另一种方式。与之对应，爵、觚等酒器在周代的衰竭，乃系周礼对殷礼的“损”了。历代以来出土的三代青铜彝器，可谓林林总总，已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器群，并成了复原和后人目睹三代一千多年青铜文明史的实物材料。

三代而后，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间，朝代更迭，物质原料的日益更新，都没能冲击《周礼》，相反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宗法《周礼》并视为治国的根本。于是，自汉代开始，铁、原始陶器、瓷器等等，都步入礼坛，被做成了礼祭器物。在质地上固然有异于三代的青铜彝器，可其用途与铸造它们的本意，以及统治者对他们的占有和垄断情况，和三代统治者垄断青铜器毫无两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明正赖寓于礼才得承传不衰。

历代统治者拼命维持纲常即礼的原因，就在于礼有维护统篇的作用。《论语·为政》载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通过对比，说明用礼教导驯化人民治国要比以刑威民强得多。人民会在知礼之后，心甘情愿地遵守一切道德纲常，不冒犯时代和社会要求自己应恪守的准则、规范。有如此作用的礼到底是什么，朱熹的解释是“制度品节也”，即国家政府制定颁行的一切制度及个人的道德品行。

当然，要想治理好国家，达到统治与被统治的协调，光要求被统治者恪守礼远远不够，它同时更严格更高地要求统治阶层内部都要依自己的地位而遵从国家礼制要求自己应遵从的一切，自天子、诸侯而卿、士概莫能外。这就是自孔子而后，儒家倡导的礼治。在他们看来，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才始能律人，也只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分、遵守礼制、没有僭越时，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并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要求被统治者。这便是老夫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荀子在言及礼的作用时，更进一步，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由于历代统治者或参与制定统治政策的人，都熟知这些，所以他们无不要求被统治者懂礼并遵从礼。不管对哪一

阶层来说，都不要僭越。统治者不要超越自己的身份过分贪求更多的特权，被统治者也不能有服从统治以外的奢望。

受礼所带来“耻”、“格”的约束，并在法律的威慑下，渴求生活安稳的人们便只好远刑法而近礼仪，以求达到统治者要求的“有耻且格”的境界，成为统治者眼中的顺良百姓，避免受刑法的制裁。就此看，礼与法在维持统治秩序的协调上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其差别仅在于礼是驯化、引导人们学为好人，而法则在于约束限制人们不得越礼，走出社会要求人们遵守的诸种规范而为坏人。正是在这种不得不学礼守礼之中，在政府的要求和引导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便在不知不觉中也是在潜移默化中都迫使和要求自己成为知礼、懂礼、守礼者，从而能为政府、法律及世俗所容，也成为人们羡慕的孝子、忠臣之楷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从中获取了好处，被统治者因老实听话而被国家赐以名爵，而统治者则看到了普天之下亿万臣民俯首其前为臣为民的王道所在，礼成了协调统治秩序的手段。

于是，在诸代王朝的不懈努力下，礼在封建国家成了高于一切的东西。统治者以礼来治国即为“礼治”，被统治者遵守礼仪为良民是为守礼和知礼。中国也由此而成了所有国人共同标榜且引以自豪的“礼仪之邦”。历代的国人都狭隘顽固地认为只有自己生活的这块地方才是王道乐土，也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才进化、懂礼仪。域外即为蛮荒不毛之地，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人都是不懂礼仪且残忍不道的饕餮之辈，统贬称他们为“夷”、“狄”、“蛮”、“戎”。当然，像任何一种东西都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一样，这种传统的认识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来对待，也要看到“礼”的积极方面。

礼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持久的因素所在，此乃世界上自古至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曾具备的，这足以作国人称道

“礼仪之邦”的资本。历代的中国人，为了能继续标榜自己是礼仪之邦中的一分子，且有向所谓的夷狄之人炫耀的资本，就只好不断地学习完善自己。这种鞭策作用，促使国人一代比一代走向更高的文明，中国六千年的文明缘是得承传不绝，此足以让每一个炎黄子孙自豪。

在民族的融合与文明的传播上，“礼”同样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是表现在民族融合方面，自匈奴、鲜卑、羯、氏、羌到契丹、女真、蒙古及满洲诸民族，它们或与汉民族朝廷为敌而相攻杀，或靠武力入进中原，都存在有与汉族人民和汉人政府的交流，不管其方式是友好学习或为仇敌而攻杀，但他们对汉族文明的仰慕则是相同的。推行汉化政策，借鉴和照搬汉族政府的统治方法，提倡礼治、尊儒尊孔、推广儒家诸经典，无一不是他们渴求学习“礼”的表现。而像清朝统治者禁止文人以夷狄目视他们，正说明了他们在汉族先进文明面前的自卑与不敢抬头，是对先进文明之羡慕心理膨胀所致。这种对礼的渴求、仰慕与不遗余力的学习，正成了中国文明的凝聚力。

礼作为帝王时代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是维护统治、协调统治秩序的手段之一，历代朝廷无不遵从、贯彻礼治，并以《周礼》为治国大纲。

根据《周礼》所记，自天子、诸侯、卿、士而至国人、奴、隶、奚、皂等附庸，整个国家之内被划分成了不同的众多阶层，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归属。而不同的阶层，国家都规定它可以享有的相应特权。这样，便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礼制级别。任何人都不能超出自己所属级别的范畴，若向上超出是为僭越，为国家法律所不容，向下滑坡则又为同济或世俗瞧不起。于是，人们便只好生活活动在先天生成及为其划定的级别圈子里，这就是礼。

礼制之有，系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等级制度而作出的一种规定。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世，礼的基本框架、雏形都已形成，以后经夏、商、西周三代的不断完善与补充，最终便有了今日可见诸典籍记载的周礼。而《周礼》作为治国的纲要自西周以降及明清，代相因用不改，此足见其影响的深远了。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自三皇五帝而夏、商、西周前后近两千年的历史时期是礼制——中国文明的奠基与蓬勃发展时期。然而，这种好景并不是永恒的，像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其发展道路上的迂回同样也不可避免，这就是历史规律。于礼而言，自古及今，它并不都是永占辉煌，也有着不尽的辛酸，这便是历史上儒家与时人、世人都惊呼礼崩乐坏的黑暗时期。

历史的第一次礼崩乐坏，是紧随礼制步入盛世的西周而来临的。西周晚期，伴随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政治等各方面的要求也有所增加。于是，长期以来维系社会稳定的世卿世禄奴隶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主要表现在强大起来的新兴贵族对原有礼制的不遵守，和僭越使用高出自己级别身份的诸种礼器。具体地说，就是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与王朝卿士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或一鼎的级别，已遭冲击。河南三门峡上村虢国岭墓地两次发掘的九鼎八簋墓，其墓主人丁是虢国之君的世子，一为虢君。而虢君之墓，除九鼎之外，还有陪鼎（包括镬鼎、羞鼎），合计正为十二数，与《周礼》所载“王一举鼎十有二”的用鼎制度相合。考诸史实，虢在两周世为国家重臣，对国家的安稳和领土的完整建有功勋，此既载于文献，又有一系列虢国铜器铭文为证，当两周之际，虢郑诸君更成了周王室的支柱，赖有他们的努力才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尤其当西周被犬戎、缁、申联军攻破、幽王被弑的变故中，即位的平王顺利东迁也是虢、郑、